

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偏向性与居民消费

王文甫，曾 斌

(西南财经大学 财政税务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摘 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消费扩容，消费扩容的重点在于农村，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目标在于提振农村消费需求，其实施又依赖财政支出的支撑。通过将城乡二元结构纳入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能够探讨在此背景下，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对消费不足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消费不足的原因可能在于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城乡收入分配失衡。具有城市偏向性的财政支出加剧了这一失衡，即我国财政支出长期侧重于城市投资性支出，进而推动城市的要素回报增加。虽然农村部门的劳动可以流入城市，分享一部分城市发展的收益，但农村部门无法进入资本市场，资本收益主要由城市居民获得，使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进一步导致我国整体的消费不足。偏向农村的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这种情况，但难以逆转财政支出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因此，为了实现消费的扩容提质，政府应采取综合措施，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关 键 词：财政支出结构；城乡二元结构；居民消费；动态随机一般均衡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 (2025) 04-0003-15

DOI:10.13676/j.cnki.cn36-1030/f.20240621.001

一、引言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其中，消费扩容被认为是推动国内大循环的关键一环。而在这一过程中，乡村的地位和作用愈加凸显。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消费不足的问题始终存在。为应对这一挑战，我国政府采取了多种财政政策，以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并促进消费。然而，在刺激消费需求方面，这些措施取得的成效往往有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在于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更体现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分配上。城市地区相对繁荣，而农村地区则面临服务短板，城乡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难以缩小，限制了整体消费能力的提升。因此，解决消费不足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城乡二元结构的作用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显然，乡村振兴在推动国内大循环和消费扩容中具有核心地位。在此背景下，分析城乡二元结构与消费水平的关

收稿日期：2024-01-07 修返日期：2024-04-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世界经济不确定性的测量、对中国金融风险效应及传导机制研究”（22AZD120）

作者简介：王文甫，西南财经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财政理论与政策研究；曾斌（通信作者），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财政理论与政策研究，联系方式 zengbin1228@qq.com。

联性，揭示财政政策在提振消费方面收效甚微的深层次原因，对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和阶段性成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财政支出如何影响消费，是经济学中一个重要且存在较大分歧的话题。基于不同的消费者行为假设，不同的经济学流派所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传统的真实经济周期（RBC）模型在李嘉图型居民假设下，认为消费受长期收入的影响。财政支出的扩张意味着未来税收的增加，从而减少理性经济人的预期收入，因此当期消费会减少。而凯恩斯主义则认为并非所有消费者都是李嘉图型居民，由于借款约束及其他原因，消费受当期收入而非长期收入的影响。因此，财政支出扩张会带来消费者当期收入的提高，最终导致消费增加。

与理论研究的巨大分歧不同，绝大部分实证研究支持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挤入效应，只有较少学者得出相反的结论（Ramey 和 Shapiro, 1998；Burnside 等，2003；Mountford 和 Uhlig, 2004；Bouakez 和 Rebei, 2005；Coenen 和 Straub, 2009）。但是，对于挤入效应大小的估计则不尽相同。一些文献认为挤入效应较大且显著（Fatas 和 Mihov, 2001；Blanchard 和 Perotti, 2002），而另一些研究则认为挤入效应较小且并不显著（Mountford 和 Uhlig, 2004；Coenen 和 Straub, 2009）。然而，上述结论并不一定符合我国的经济现实。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长期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居民消费率却始终处于较低水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上述文献的研究对象并非典型的二元经济体（胡永刚和杨智峰，2009），而我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正是城乡二元结构。在这一背景下，财政支出需要区分用于城市还是农村，消费也需要区分城市消费与农村消费。笼统地使用财政支出与消费的概念，可能会导致结论与现实相反。

此外，城乡二元结构本身也是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袁志刚和朱国林，2002）。付文林（2010）指出，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中国的农民收入一直难以得到切实提高，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成为消费需求难以提高的障碍之一。财政政策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吴俊培和张昊泽（2024）发现，教育和社会保障支出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积极作用，但当城镇化水平超过 56.01% 后，这两类财政支出的影响会显著削弱。陈滔和倪志良（2023）指出，税制结构优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从而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的消费差距。吕炜和许宏伟（2015）发现，我国的土地财政具有明显的城市倾向特征，这是导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陆铭和陈钊（2004）认为，我国的经济政策具有城市倾向，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与地方政府实施的带有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密切相关。陈斌开和林毅夫（2013）从政府发展战略的角度出发，发现旨在鼓励资本密集型部门优先发展的战略导致了城市部门就业需求的相对下降，进而延缓了城市化进程，使农村居民无法有效地向城市转移，从而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框架下研究财政支出对消费作用的国外文献中，Gali 等（2007）将家庭部门区分为李嘉图型居民和非李嘉图型居民，在此设定下得出财政支出对消费具有挤入效应的结论，实现了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结果的一致性。然而，与前述国外文献类似，该文也未考虑城乡二元结构。

国内使用包含城乡二元结构的 DSGE 模型的文献较少。杨翱和李长洪（2016）利用包含城乡二元结构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不同财政支出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但其模型未考虑垄断竞争与价格黏性，且研究主题聚焦于经济波动。骆永民和樊丽明（2019）构建了一个包含城乡经济结构的真实经济周期模型，通过比较静态分析研究了在宏观税负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税制结构变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他们研究发现，提高间接税比重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而在间接税比重不变

的情况下,工业品商品税在间接税中的比重越大,越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的创新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从研究视角看,本文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视角研究了城乡二元结构下我国财政支出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填补了以往文献在这方面的不足。从研究方法看,本文将城乡二元结构与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相结合。相较于以往的真实经济周期模型,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考虑了市场失灵及不完全竞争等现象,为分析政策在经济调控中的作用提供了更契合的分析框架。此外,城乡二元结构是发展中国家显著的经济特征,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城乡二元结构对我国经济有着深远影响。在运用国外宏观经济模型研究中国问题时若忽视这一经济背景,可能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从研究结论看,本文证实了在考虑城乡二元结构后,财政政策可能对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国外的大量研究认为财政支出对消费具有挤入效应,其原因在于未考虑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

二、制度背景与特征事实

(一)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梳理

城乡二元结构是指城市与农村之间存在显著的发展差距以及社会经济的不均衡状态。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在城乡之间表现得尤为突出。城乡二元结构是指以工业为主的城市现代部门和农村传统农业部门并存的经济结构,这一结构在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阶段都是难以避免的。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经历了形成、减弱、强化和缓慢弱化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反映了国家经济发展、政策变迁的时代特征。

改革开放前的初步形成阶段(1949—1978年)——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制度变迁的产物。为实现快速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化,政府实施了包括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统购统销、要素流动控制等政策,这些政策旨在通过压低农产品价格、提高工业品价格,从农业转移资源以支持工业发展;同时,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力流动,加剧了城乡差距。这种策略和体制安排致使资本和劳动力在城乡间的分配不平等,进一步加剧了城市与农村的发展不均衡。

改革开放初期的减弱阶段(1978—1990年)——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随着农村改革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村生产力得到显著提升,城乡经济差距有所缩小。这期间,市场经济的深化对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政府逐渐放宽对农产品价格的控制,激发了农业的经济活力。同时,乡镇企业的兴起缓解了农村的就业压力和劳动力过剩问题,促使农业生产率和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尽管城乡收入比在1983年降至历史最低的1.82,但城市的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社会服务快速发展,依然保持了对农村的优势。

市场经济加速发展时期的强化阶段(1990—2000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改革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城市经济体制经历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国企的放权让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促进个体和私营经济发展等。这些措施提高了城市的相对收入水平。同时,城市居民享有多样化的社会保障,而农村居民受制于户籍制度和就业政策,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扩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致使我国经济增速下滑,城市出现大量下岗失业人员,宏观政策更加偏向城市。

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时期的缓慢弱化阶段(2000年至今)——自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依靠出口和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使城镇居民收入显著上升,但城乡收入差距也随之扩大。2009年,城乡收入比上升至3.1。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外需减少,居民收入增长放缓。为应对这一挑战,为激发国内需求、解决产能过剩以及缩小城乡差距,政府调整财政支出,采取

了包括农民补贴、增加农业支出、实施粮油生产大县奖励政策等措施。这些政策有效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2009 年以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持续缩小，2019 年城乡收入比降至 2.64。

回顾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变迁可以发现，其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目的在于促进重工业迅速发展。随着改革开放及政策调整，这一结构经历了起伏，呈现先缓和、后加剧、再次缓和的趋势。2012 年以来，我国政府开始探索以工补农、以城带乡以及城市反哺农村。尽管这些政策使城乡差距呈现一定的缓和趋势，但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

（二）我国消费不足的特征事实

自 1997 年下半年起，中国宏观经济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变化，从供给不足型向需求不足型转变。我国逐渐告别了短缺经济，步入了过剩经济时代。其中，需求不足，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我国的居民消费率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明显变化。1997 年，居民消费率为 0.46。但到了 2010 年，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这一指标不增反降，下降至 0.34。随后虽有缓慢回升，但仍然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这一趋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正好相反，表明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

根据陈斌开（2017）整理的世界银行数据，2015 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47%，扣除政府消费后的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34%。相比之下，美国在同一年数据分别为 83% 和 68%。此外，无论是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和巴西相比，还是与同为东亚文化的韩国和日本进行对比，我国的最终消费和居民消费率都相对较低。

纵观 1997 年以来的居民消费数据，中国居民消费率呈下降趋势，近年来略有回升。然而，陈斌开（2017）指出，这一回升可能并非真实反映居民消费需求增长，而是因投资和净出口减少而显得消费率提高。持续低迷的消费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近年来，随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外需减弱，外部不确定性剧增。在此情景下，深入探讨城乡二元结构下财政支出对消费的影响，对于促进内需，增强我国经济增长的自主性、可持续性和韧性，确保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深刻影响了消费模式和消费能力。城市与农村在收入水平、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导致了两者在消费能力上的差距。城市居民因收入较高且社会保障体系较为完善，消费能力较强，消费模式现代化；而农村居民受限于较低的收入水平和较少的社会保障，消费能力相对较弱，消费模式较为传统。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尤其是在农民工大量进城的背景下，城乡经济互动加深，推动了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和城市消费市场的扩张。

此外，财政政策的调整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提升消费水平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不断调整财政政策，通过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财政支出、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村教育与医疗保障，逐渐激发农村经济活力，提升了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这些政策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农村消费的增长，同时也促进了城乡消费市场的整合和互动。随着城乡消费差距的缩小，消费需求结构逐渐趋于平衡，城乡消费模式也日益融合。总而言之，城乡二元结构深刻影响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与模式。这一结构性差异不仅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特定挑战，也为理解财政政策对消费的影响提供了关键视角。

三、模型构建

本文构建了城乡二元结构下的新凯恩斯主义 DSGE 模型。为刻画城乡二元结构，本文将家庭部门区分为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同时区分了农业与工业生产函数。政府支出依据 Arrow 和 Kurz（1970）、Turnovsky（2000）的分类，分为生产性公共支出和消费性公共支出。其中，生产性公共支出可直接进

入生产函数,通过影响资本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消费性公共支出则直接进入居民的效用函数,能直接提升居民福利水平。此外,政府提供的转移支付通常被视为消费性公共支出(Barro, 1990)。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将政府支出分为消费性支出与投资性支出,同时考虑到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将政府支出细分为用于农村及城市的消费性支出与投资性支出。

(一) 家庭部门

鉴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本文将家庭部门区分为农村居民(用下标 1 表示)与城市居民(用下标 2 表示),二者在模型中的主要区别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劳动力流动方面存在制约,假设农村劳动力能够在农村与城市间流动,而城市劳动力则不可流向农村。其二,假设农村居民在城市获取的劳动报酬受到歧视,农村居民仅能获得其边际贡献的一部分作为报酬。这一设定所反映的现实情况是,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流动并未促使城乡工资差距实现均等化,相反,城乡工资差距以及城市内部职工与外来职工的工资差距仍在持续扩大(陈珣和徐舒, 2014; 骆永民和樊丽明, 2019)。其三,假设农村居民无法进入金融市场与资本市场,既不能进行资本投资,也不能购买债券。

1. 农村居民

假设农村居民的效用来自消费与闲暇,其终生效用函数如下:

$$E_0 \sum_{t=0}^{\infty} \beta_1^t \left[\frac{TC_{1,t}^{1-\zeta}}{1-\zeta} + \gamma_1 \ln(1-L_{r,t}-L_{u,t}) \right] \quad (1)$$

其中, E_0 表示期望算子; β_1 表示农村居民的主观贴现率, ζ 是居民的相对风险厌恶系数; $TC_{1,t}$ 表示农村总消费,由农产品消费、工业品消费以及政府用于农村的消费支出这三部分构成,具体表达式为 $TC_{1,t} = [\omega_1 C_{1at}^\eta + (1-\omega_1) C_{1ft}^\eta]^{1/\eta} G_{1c,t}^{\alpha_{1gc}}$; C_{1at} 表示农村居民对农产品的消费; C_{1ft} 表示农村居民对工业品的消费; ω_1 表示农产品占总消费的比重; η 是居民将工业品与农业品进行替换的意愿参数; $G_{1c,t}$ 是政府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性支出; α_{1gc} 表示政府用于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系数(黄隰琳, 2005); γ_1 表示闲暇占农村居民效用的相对权重; $L_{r,t}$ 表示农村居民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动时间; $L_{u,t}$ 是农村居民投入工业品生产的劳动时间,简称为农民工劳动。农民工这一概念与我国特有的户籍管理制度相关,是指户籍在农村但主要在城镇从事非农生产活动的劳动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等, 2011)。

农产品的生产函数为:

$$Y_{a,t} = A_{1t} L_{r,t}^{\alpha_{1r}} m^{1-\alpha_{1r}} G_{1k,t}^{\alpha_{1gk}} \quad (2)$$

其中, $Y_{a,t}$ 表示农产品产出; A_{1t} 是农业生产函数的全要素生产率,其服从一阶自回归过程; $L_{r,t}$ 是农村居民投入农产品生产的劳动; m 表示人均土地使用面积; $G_{1k,t}$ 则表示政府对农村的投资性资本存量; α_{1r} 表示农村劳动的产出弹性; α_{1gk} 表示农村投资性资本存量的产出弹性。

农村居民面临的预算约束条件可以写成如下形式:

$$P_{a,t} C_{1a,t} + (1+\tau_{cf}) P_t C_{1f,t} = (1-\tau_l) W_{1t} L_{u,t} + P_{a,t} Y_{a,t} \quad (3)$$

其中, τ_{cf} 、 τ_l 分别表示工业品消费税与劳动所得税; $P_{a,t}$ 、 P_t 分别表示农产品、工业品的价格; $Y_{a,t}$ 则表示农村居民从事农产品生产得到的产出; W_{1t} 表示农村居民从事工业生产劳动获得的工资收入。农村居民在给定的预算约束与生产函数约束下,选择 $C_{1a,t}$ 、 $C_{1f,t}$ 、 $L_{r,t}$ 、 $L_{u,t}$ 来实现终生效用的最大化。通过构建拉格朗日函数并对选择变量求导可以得到相应的一阶条件方程组。

2. 城市居民

与农村居民类似,城市居民的效用函数如下:

$$E_0 \sum_{t=0}^{\infty} \beta_2^t \left(\frac{TC_{2,t}^{1-\zeta} - 1}{1-\zeta} - \gamma_2 \frac{Z_t^{1+\psi_e}}{1+\psi_e} \right) \quad (4)$$

其中, Z_t 表示城市居民的劳动时间; ψ_e 表示劳动供给弹性的倒数。其余参数表达的意义与农村居民相类似, 仅用脚标来区分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假设城市居民的劳动不具有流动性, 只能为城市企业供给劳动力, 而不会向农村流动。相比农村居民, 城市居民的预算约束更为复杂, 其包括了资本投资与债券购买。城市居民面临如下的预算约束:

$$P_{a,t} C_{2a,t} + (1+\tau_{cf}) P_t C_{2f,t} + P_t I_t + \frac{B_t}{R_{b,t}} = (1-\tau_l) W_{2,t} Z_t + P_t d_t + (1-\tau_k) R_t K_t + B_{t-1} \quad (5)$$

其中, τ_{cf} 、 τ_l 、 τ_k 分别表示工业品消费税、劳动所得税和资本所得税; I_t 表示投资; B_t 表示 t 期购买的政府债券; $1/R_{b,t}$ 表示政府债券的价格; $W_{2,t}$ 表示城市居民的工资收入; d_t 表示城市居民获得的企业权益支付 (在城市中间品厂商中会有明确定义); R_t 表示资本收益; K_t 为资本存量。

假设资本存量 K 服从资本积累方程为:

$$K_{t+1} = (1-\delta)K_t + I_t \quad (6)$$

其中, δ 为资本折旧率。城市居民在给定的预算约束下, 选择 $C_{2a,t}$ 、 $C_{2f,t}$ 、 Z_t 、 B_t 、 K_{t+1} 来实现终生效用最大化。

(二) 生产部门

假设农业部门负责生产农产品, 城市部门负责生产工业品。农产品的生产过程相对简单, 在前文提及家庭部门的农村居民部分时已有所涉及, 此处不再赘述。假设工业品的生产由两类厂商完成, 一类为工业最终品厂商, 另一类为工业中间品厂商, 下文将它们分别简称为最终品厂商与中间品厂商。最终品厂商将各类中间品作为生产要素, 用于生产供最终消费的工业品; 而中间品厂商则以资本与劳动作为生产要素, 生产工业中间品以供最终品厂商用于生产。

假设存在一个中间企业的连续统, 且每个企业生产一种与其他企业不同的中间产品 $Y_{fi,t}$ 。在第 t 期, 中间品的连续统被完全竞争的工业最终品企业打包生产成第 t 期的最终工业品 Y_{ft} , 即工业最终品由一个典型厂商在竞争性环境下通过对连续分布的中间产品进行加总来生产。

中间商品生产商从家庭部门雇佣劳动, 使用资本生产中间产品, 并出售给最终商品生产商。每个中间品 j 仅由一个中间品厂商 j 进行生产, 这里假设生产函数中的政府支出由政府部门决定, 不受中间品厂商决策的影响。生产函数设定为标准的柯布 - 道格拉斯函数:

$$Y_{fi,t} = A_{2,t} K_{i,t-1}^{\alpha_k} Z_{i,t}^{\alpha_e} L_{iu,t}^{\alpha_{1u}} G_{2k,t}^{\alpha_{2k}} \quad (7)$$

其中, 下标 i 代表中间品厂商; $Y_{fi,t}$ 表示中间品产出; $A_{2,t}$ 表示工业品全要素生产率; $G_{2k,t}$ 表示城市公共资本存量; α_k 、 α_e 和 α_{1u} 分别表示资本、城市劳动和农民工劳动的产出弹性, 且 $\alpha_k + \alpha_e + \alpha_{1u} = 1$ 。根据厂商的成本最小化原则以及生产函数约束能够推导出中间品厂商的边际成本为:

$$\phi_t = A_{2,t}^{-1} G_{2k,t}^{-\alpha_{2k}} R_t^{\alpha_k} W_{2,t}^{\alpha_e} W_{1,t}^{\alpha_{1u}} \alpha_k^{-\alpha_k} \alpha_e^{-\alpha_e} \alpha_{1u}^{-\alpha_{1u}} \quad (8)$$

对于城市劳动和农民工劳动的需求方程分别为:

$$W_{2,t} = \phi_t \alpha_e Y_{fi,t} / Z_{i,t} \quad (9)$$

$$W_{1,t} = \psi \phi_t \alpha_{1u} Y_{fi,t} / L_{iu,t} \quad (10)$$

在原方程的右侧乘以 ψ , 用以刻画农民工与城镇工人的劳动回报差距, 该参数表示农民工从其对工业产出边际贡献中获取工资收入的比例, 骆永民和樊丽明 (2019) 将其定义为“农民工就业公平

度”。显然有 $0 < \psi \leq 1$ ，且该参数越大说明农民工就业越公平。

对于资本的需求方程为：

$$R_t = \phi_t \alpha_k Y_{f,t} / K_{t-1} \quad (11)$$

通过加总生产函数后可得到总的生产函数及要素需求函数，这里不再列出。

由于政府投资性资本的存在，且假设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则根据欧拉产品分配净尽原理，必然存在一部分属于政府投资性支出的收益，以及一部分由于农民工就业不公平导致的对农民工劳动收入的攫取。这里假设这两部分收益均以权益收益的形式分配给了城市居民。

$$d_t = \phi_t \alpha_{2gk} Y_{f,t} / G_{2k,t} + (1 - \psi) \phi_t \alpha_{1u} Y_{f,t} / L_{u,t} \quad (12)$$

假设中间品厂商按照 Calvo (1983) 的方式对企业的价格进行设定。

(三) 政府部门

本文主要关注财政的投资性支出与消费性支出，转移支付被认为包含在消费性支出中 (Barro, 1990)。假设政府的支出只包含各项投资性与消费性支出以及偿还债务，政府的收入主要来自税收与借债。政府需要遵守下列预算约束：

$$P_t (G_{1c,t} + G_{2c,t} + G_{1i,t} + G_{2i,t}) + R_{b,t} B_{t-1} = \tau_{cf} P_t (C_{1f,t} + C_{2f,t}) + \tau_k K_t R_t + \tau_l (W_{2,t} Z_t + W_{1,t} L_{u,t}) + B_t \quad (13)$$

上式左边为政府部门的支出，分别为政府对农村、城市的消费性支出，公共资本投资和国债付息；右边为收入，包括工业品消费税、资本所得税、劳动所得税以及所发行债务。

假设政府投资按照公共资本积累方程进入公共资本存量。公共资本的积累方程为：

$$G_{j,t,k+1} = (1 - \delta_{gk}) G_{j,t,k} + G_{j,t}, j = \{1, 2\} \quad (14)$$

其中， δ_{gk} 表示公共资本折旧率。为了研究在财政支出总额保持不变时，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本文假设政府按照如下规则来安排消费性支出、公共资本投资以及转移支付。

$$O = \omega_j H_{j,t} (Y_{a,t} + Y_{f,t}) \quad (15)$$

其中， $O = \{G_{1c,t}, G_{2c,t}, G_{1i,t}, G_{2i,t}\}$ ， ω_j ($j = 1c, 2c, 1i, 2i$) 表示财政支出与总产出之比，并假设其外生给定。假设 $H_{j,t}$ 为随机冲击，均服从一阶自回归过程。

在更为细化的财政支出框架下，不同类型的财政支出对各区域的收入与消费水平具有显著影响。在城市区域，政府对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资性支出，通过提升生产率、优化资源配置以及降低交易成本，显著增强了经济活力。与此同时，城市的消费性支出通过改善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进而直接刺激消费需求。在农村区域，投资性支出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现代化，提升农民的生产能力和收入水平，从而直接提高其消费能力。消费性支出则通过改善公共服务（如教育和医疗保健），进一步提升农民的消费能力和生活质量。

从整体视角看，财政支出还通过影响城乡收入差距，间接作用于居民消费率。依据生命周期理论，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其边际消费倾向通常会下降。因此，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财政支出政策，可能会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占比，但由于城镇居民较低的边际消费倾向，其收入提高并不一定能显著提升整体消费水平，反而可能导致整体消费率下降。

(四) 市场出清

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债券市场的出清在前面的设定中已经满足，这里不再赘述。由于财政支出是以总产出的比例设定的，总产品市场的出清条件为：

$$P_{a,t} Y_{a,t} + P_t Y_{f,t} = P_{a,t} C_{1a,t} + P_{a,t} C_{2a,t} + P_t C_{1f,t} + P_t C_{2f,t} + P_t I_t + P_t G_T \quad (16)$$

其中， G_T 为所有政府支出之和，即 $G_T = G_{1f,t} + G_{2f,t} + G_{1i,t} + G_{2i,t}$ 。

四、参数校准和设定

在本文模型中，参数校准方式分为两类。一类是常见参数，依据以往文献进行校准；另一类是刻画代理人主观行为的参数，这些参数难以确定，且以往文献较少涉及。针对后者，本文根据现实中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比值及模型稳态方程反向推导出来。其中，主要宏观经济变量比值涵盖城乡产出比、总投资与总产出之比以及政府支出与总产出之比。这些数值基于 2003—2014 年相应宏观经济变量的均值确定，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此外，农村部门就业人数采用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来表示，农民工就业人数则来自 2012—2022 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均取 2008—2021 年数据的均值；二者的比值作为农业劳动与农民工劳动的稳态比值，其取值为 0.84。

（一）农村部门的主要参数

农村部门参数包括 $\{\beta_1, \zeta, \omega_1, \gamma_1, m, \alpha_{1gc}, \alpha_{1r}, \alpha_{1gk}\}$ 。农村居民主观贴现率 β_1 设为 0.997；居民相对风险厌恶系数 ζ ，参考张伟进等（2015），取值 1.04；农村居民农产品消费所占份额 ω_1 设定为 0.25；农村居民效用偏好参数 γ_1 ，根据稳态方程，设定为 1.06；人均土地均值 m 取值 2.34，采用《中国统计年鉴》中 2012 年年末的家庭经营耕地面积的人均值表示。农村消费与政府农村消费支出的关系系数 α_{1gc} ，依据黄贇琳（2005）取值 0.37。土地产出弹性为 $1 - \alpha_{1r}$ ，吕捷和王高望（2015）通过农产品产量与种植面积变化对土地的产出弹性进行了估算，其值为 0.7，则农村劳动的产出弹性 α_{1r} 为 0.3。其模型中并未考虑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性，且不存在政府投资性支出，所以骆永民和樊丽明（2019）将农村劳动的产出弹性 α_{1r} 设为 0.35，本文也采取这一设定。而对于政府对农村的投资性资本存量的产出弹性 α_{1gk} ，本文取值为 0.1。

（二）城市部门的主要参数

城市部门的参数包括 $\{\beta_2, \omega_2, \gamma_2, \alpha_{2gc}, \delta\}$ 。城市居民的主观贴现率 β_2 ，与农村居民相同，设定为 0.997。城市居民农产品消费所占份额 ω_2 ，取值逻辑与农村居民一致，设定为 0.15。城市居民效用偏好参数 γ_2 ，同样根据稳态变量的现实均值，设定为 1.87；城市居民消费与政府城市消费支出的关系系数 α_{2gc} ，与农村部门保持一致，设为 0.37。资本的折旧率 δ ，通常设定为 10 年折旧完毕，即每季度的折旧率为 0.025。

（三）工业品生产部门主要参数

工业品生产部门参数包括 $\{\psi, \alpha_{1u}, \alpha_k, \alpha_e, \alpha_{2gk}\}$ 。农民工就业公平度 ψ ，对于此参数的设定是根据稳态变量的现实均值和方程倒推求得，取值为 0.13。资本的产出弹性 α_k 的取值在文献中差别不大，大都在 0.5 左右，但是本文的劳动要素还考虑了农民工劳动，故借鉴骆永民和樊丽明（2019），将各要素产出弹性 α_{1u} 、 α_k 、 α_e 分别设为 0.15、0.65、0.2。政府城市投资性支出的产出弹性 α_{2gk} 设为 0.1。

（四）政府部门主要参数

政府部门主要参数包括 $\{\tau_1, \tau_{cf}, \tau_k, \delta_{gk}, \omega_{1i}, \omega_{2i}, \omega_{1c}, \omega_{2c}\}$ 。劳动所得税 τ_1 、工业品消费税 τ_{cf} 、资本所得税 τ_k ，参照骆永民和樊丽明（2019），分别取值 0.1、0.25、0.1；公共资本折旧率 δ_{gk} ，参考饶晓辉和刘方（2014），取值 0.1。政府对农村和城市的消费性支出和投资性支出，本文假定为外生给定，其占总产出的比重根据 1978—2006 年我国的财政支出相关数据的均值设定为 0.17。农村的投资性支出比重 ω_{1i} ，按照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均值，设定为 0.03；城市的投资性支出比重 ω_{2i} ，则根据国家财政支出项目中的基本建设支出比重，设定为 0.07。总支出中扣除农村和城市的投资性支出

后统一假定为消费性支出，故设定为 0.07。由于难以区分哪些消费性支出属于农村，哪些属于城市，故假设消费性支出按照一定比例用于农村。鉴于我国长期的城市偏向性的财政支出结构（陆铭和陈钊，2004；吕炜和许宏伟，2015），本文设这一比例为 0.3，则用于城市的消费性支出比例为 0.7，即农村消费性支出因子 ω_{lc} 为 0.02 ($0.3 \times 0.07 \approx 0.02$)，城市消费性支出因子 ω_{2c} 为 0.05 ($0.7 \times 0.07 \approx 0.05$)。

五、数值模拟分析

（一）生产率冲击下的脉冲响应分析

居民消费率反映居民总消费与总产出之间的比例关系。如图 1 所示，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生产率受到正向冲击，居民消费率均会得到提升。同时，这两类冲击也有助于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对于农业生产率冲击而言，其通过提高农业的边际产出，进而增加农业的工资水平。这促使农村居民将更多劳动力投入农业生产。由于城市居民的部分收入来源于农民工的工资，随着农民工投入劳动力的减少，这部分收入也会相应降低。尽管城市劳动和投资水平有所下降，但城市劳动工资增长和资本利息上升带来的财富效应超过了替代效应的影响。随着工业生产率的提升，工资与利息增加，城市家庭可能会减少劳动和资本的投入，转而增加消费，从而显著提升城市总消费。对于农村家庭来说，工业生产率的提升意味着农民工工资增加，进一步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消费。然而，工资上涨带来的财富效应超过替代效应，导致农民工劳动投入减少。总体而言，任何旨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均有利于消费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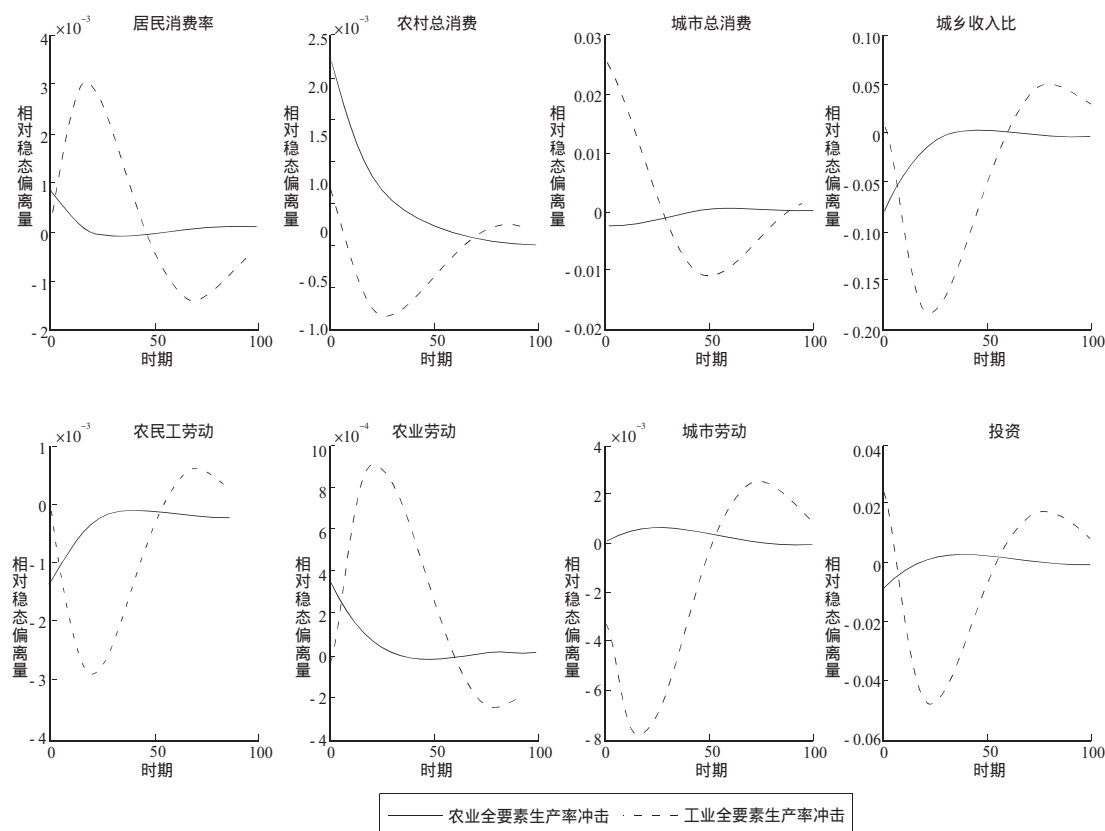


图 1 外生冲击下主要经济变量的脉冲响应图

（二）政府支出冲击的脉冲响应分析

政府支出的脉冲响应如图 2 和图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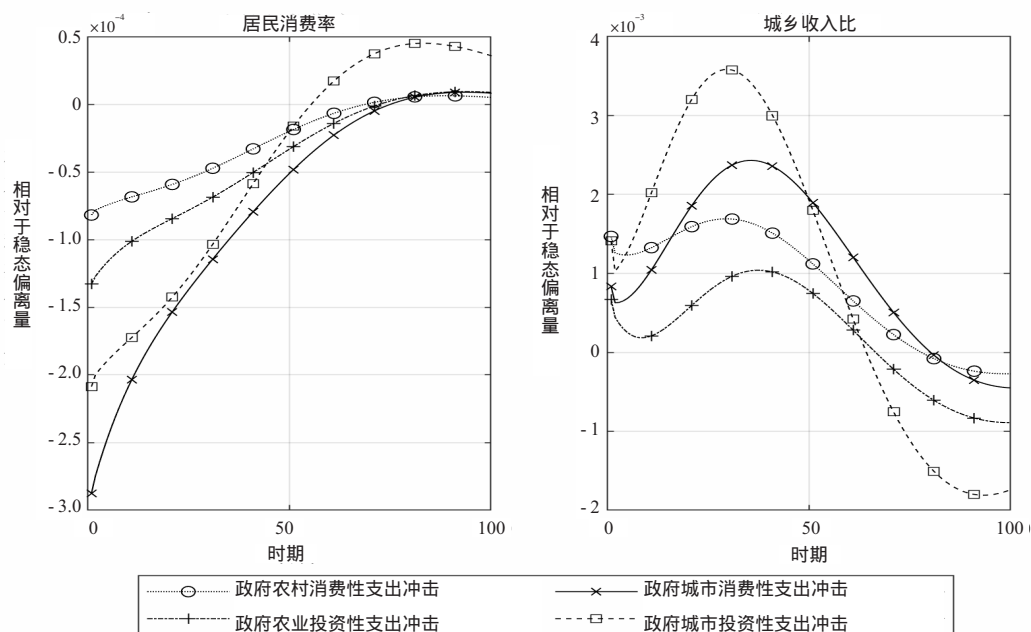


图2 政府不同支出冲击下的脉冲响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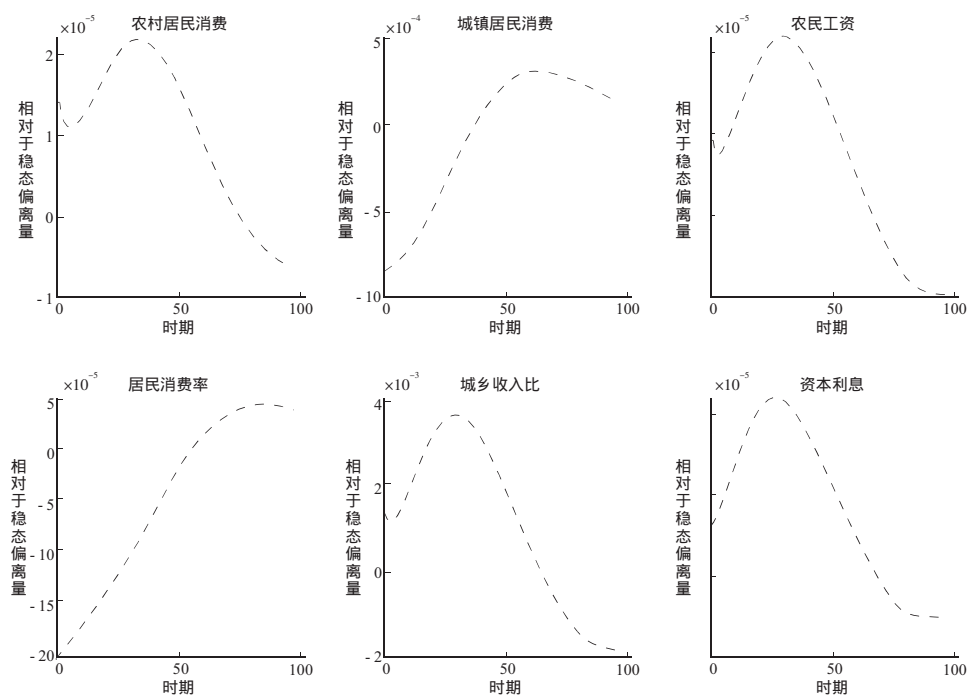


图3 政府投资性支出冲击下主要经济变量的脉冲响应图

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的影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由图2可知,在本文模型中,政府不同的财政支出对私人消费均表现为挤出效应。相较于政府的农村支出,城市支出具有更强的挤出效应。对于政府城市支出而言,消费性支出比投资性支出具有更强的挤出效应;而在农村支出中,投资性支出相比消费支出表现出更强的挤出效应。不同的政府支出冲击都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与居民消费率类似,城乡收入比对政府的城市支出响应更为强烈;此外,城乡收入比与居民消费率之间呈现明显的负

相关关系。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较低，边际消费倾向较高；而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相对较高，但边际消费倾向较低。随着收入差距扩大，更多收入被分配给城市居民。由于城市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低，相较于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其消费支出的增量较少。农村居民因在收入分配中增加的可支配收入较少，其消费支出也难有大幅提升，最终导致居民整体消费率下降。接下来，本文以政府城市投资性支出冲击为例，通过对主要经济变量的脉冲响应分析，进一步探究财政支出的挤出效应的产生机制。

图3显示，随着政府对城市投资性支出的增加，工业劳动与资本的边际产出增加，工资、利息也随之上升，农民工工资上涨进一步导致农民工劳动投入增加，农村劳动投入减少。尽管农村消费因收入上升有所增加，但城镇居民消费并未增加，反而下降。虽然利息上升的财富效应促使城市居民增加消费，提高效用水平，但是，替代效应导致城市居民将更多可支配收入用于投资，以提升终生效用水平。此处模型的脉冲响应与吕冰洋和毛捷（2014）提出的理论相符，他们认为政府生产性公共支出的增加通过为企业提供生产性服务，推动投资消费比上升。虽然农村居民分得了一部分政府城市投资性支出带来的正外部性收益，但因歧视性工资存在以及农村居民无法获得投资收益，更多收入被城市居民占有。城市居民因资本利息上升的替代效应，消费增长有限甚至下降。农村消费与城市消费一增一减，最终使我国整体消费增长速度低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速度，表现为居民消费率下降。

（三）反事实模拟

1. 财政支出结构调整下的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

在不改变财政支出总额的前提下，能否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改善居民消费率对财政支出的脉冲响应？本文通过调整模型中财政支出的比例参数来探讨这一问题。图4描绘了保持财政支出总额及消费性支出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在不同农村与城市投资性支出结构下，居民消费率对不同冲击的响应。可见，随着财政投资性支出越来越倾向农村，城市投资性支出冲击的挤出效应减弱，农村投资性支出冲击的挤出效应增强，但仍小于基准状态。这表明将财政投资性支出更多投向农村有助于减小城市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这个结论为政府制定财政政策提供了一种选择，即加大对农村的投资支持力度，以缓解城市居民消费下降。因此，为提振消费，政府需在城乡投资结构上取得平衡，合理的投资结构可在促进城乡经济协同发展的同时，最小化挤出效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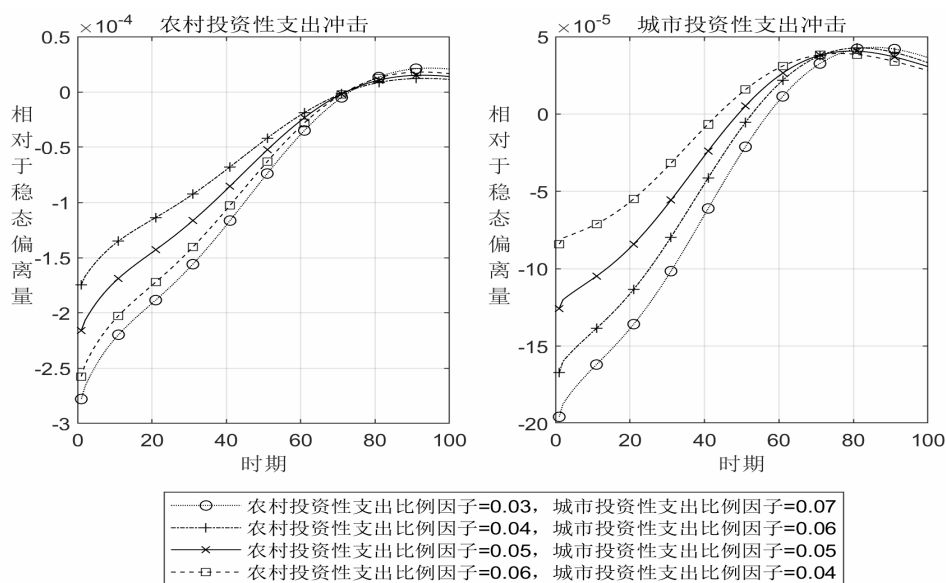


图4 不同财政投资性支出结构下居民消费率的脉冲响应图

相应地，图 5 展示了在财政支出总额及投资性支出结构不变的条件下，调整财政消费性支出结构时，居民消费率的响应情况。结果与投资性支出结构调整类似，随着财政消费性支出向农村倾斜，城市消费性支出冲击的挤出效应减弱，而农村消费性支出冲击的挤出效应增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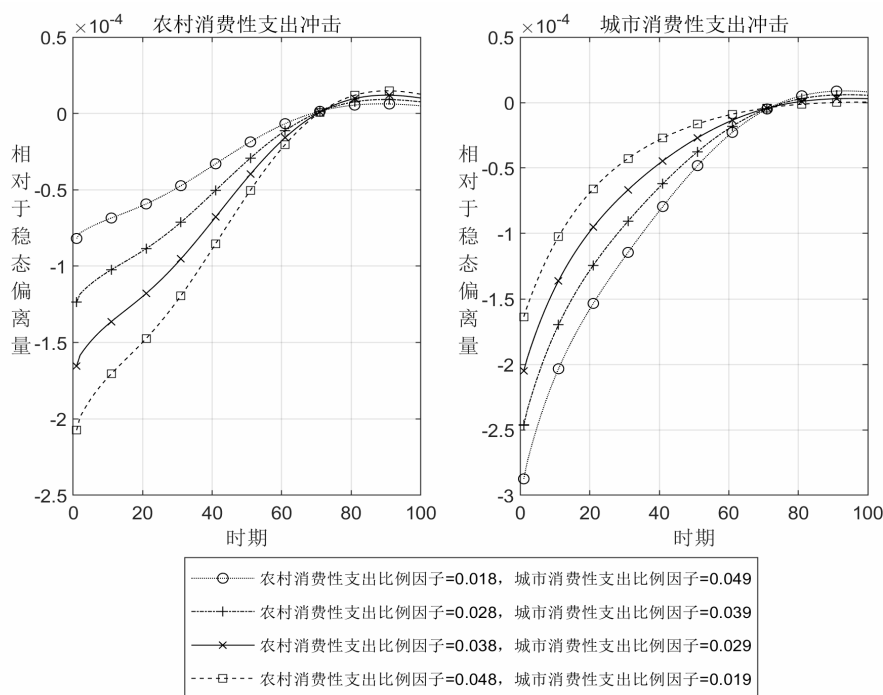


图 5 不同财政消费性支出结构下居民消费率的脉冲响应图

综上所述，在本文模型环境中，财政支出的挤出效应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单纯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将更多财政支出投向农村，并不能彻底改变财政支出对消费的挤出效应。这种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的无效性部分源于本文模型对农村家庭的极端设定，如无法投资资本市场与债券市场、农产品市场规模较小、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时受歧视等。这些设定抑制了财政支出向农村倾向性调整的作用，使农村财政支出增加对提升农村居民收入的效果有限，难以通过这些政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拓宽农村居民收入渠道、公平对待农村居民就业等弱化城乡二元结构的政策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提高居民消费率。

2. 城乡一体化下的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

作为对比，本文探讨了不存在城乡二元结构时，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去除城乡二元结构相关设定，包括农村与城市家庭、农业与工业的区分，模型参数大致不变，财政支出仍区分为消费性支出与投资性支出。在此情境下，财政支出对主要经济变量的脉冲响应如图 6 所示。可见，财政投资性支出挤出了投资，政府支出增加可能通过借贷市场吸收大量资金，提高借贷成本，减少私人部门投资意愿。但初始阶段利率下降，可能反映市场对政府投资增加的积极反应，预期其会刺激经济增长、增强市场信心。随后利率上升可能是市场对长期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或是预期政府支出将增加通货膨胀压力，促使中央银行提高利率。对于消费而言，初始利率下降会增加消费和投资，家庭和企业更倾向于增加支出；随后利率上升则可能抑制这种趋势，减少消费和私人投资。长期来看，政府投资性支出通过完善基础设施、提高生产率和创造就业机会来促进经济增长，间接支持消费，使消费呈现回升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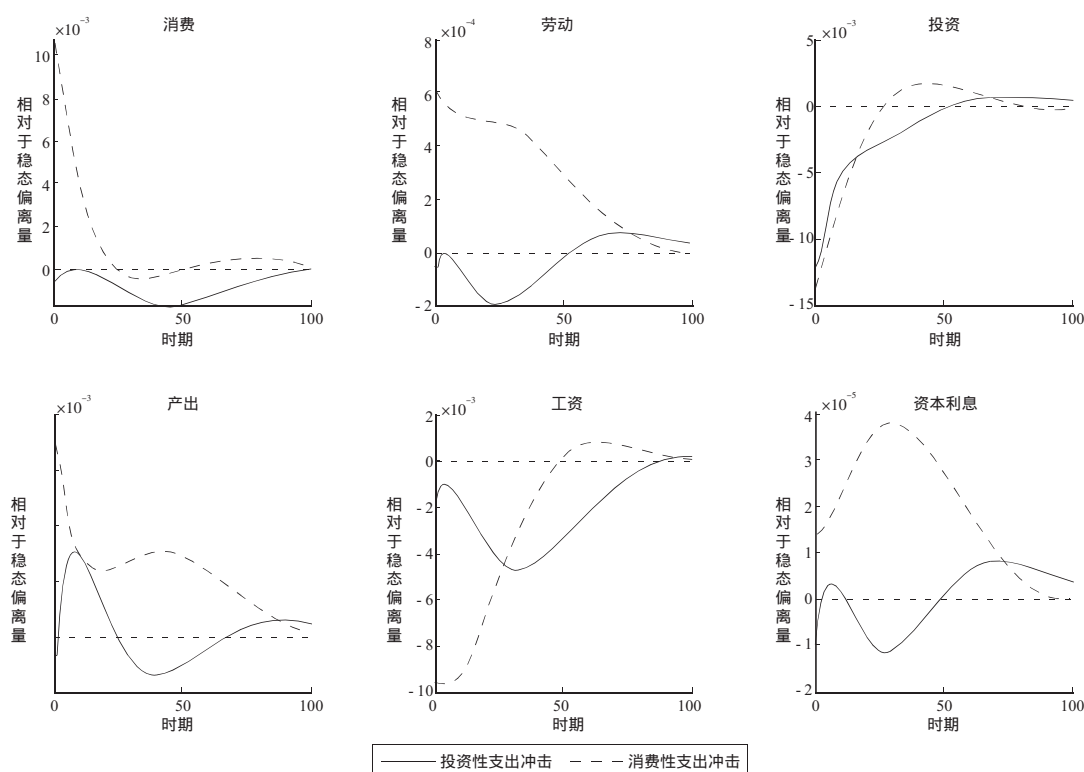


图6 城乡一体化下主要经济变量对财政支出冲击的脉冲响应图

对于财政消费性支出而言,在实现城乡一体化后,民生性支出增加能有力提振总需求,可通过增加公共服务或直接提供转移支付等形式刺激消费。从图6可知,政府消费性支出显著增加了消费和产出。对比发现,不存在城乡二元结构时,财政支出结构从投资性支出转向消费性支出或民生性支出能有效提振消费,这一结果回应了胡永刚和杨智峰(2009)的观点,证明了城乡二元结构在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关系相关研究中的重要性,为实施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支撑。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构建了包含城乡二元结构的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探究城乡二元结构下我国财政支出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基于模型的数值模拟分析结果,本文得出以下三个主要结论:(1) 农业或工业中的技术进步均有利于提振消费。(2) 在城乡二元结构下,我国长期存在的消费不足与城市倾向的财政支出政策有关。模拟结果显示,当前我国财政支出政策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且政府城市支出的挤出效应远大于农村支出;此外,城市支出增加相比农村支出增加更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3) 在本文城乡二元结构模型环境下,所有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均表现为挤出效应。模拟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发现,从城市倾向转变为农村倾向的财政政策并不能扭转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解除城乡二元结构设定后,投资性财政支出对消费仍表现为挤出效应,而消费性支出则能够提振消费。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四点政策建议。一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支持。鉴于城市倾向的财政支出政策与消费不足的关联,建议政府重新调整财政支出,增加对农村地区的投资。这不仅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还能提振整体消费。尽管转变为农村倾向的政策不能完全扭转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但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和技术支持的投资,可促进农村经

济发展,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二是平衡城市与农村的投资性支出。尽管投资性支出在短期可能对城市消费产生挤出效应,但适当的投资性支出,特别是针对基础设施和技术创新的投资,对经济的长期增长仍至关重要。三是促进技术进步和创新。模拟分析表明,农业或工业中的技术进步均有利于提振消费。因此,政府应加大对科研投资和技术创新的支持,促进产业升级转型,提高生产效率,增加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四是坚持乡村振兴战略,努力消除城乡二元结构。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不仅违背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也不利于经济的整体发展。政府应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农村投资、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综合措施,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参考文献:

- 陈斌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中国居民消费[J]. 学术月刊, 2017, (9): 13-17.
- 陈斌开, 林毅夫. 发展战略、城市化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J]. 中国社会科学, 2013, (4): 81-102+206.
- 陈滔, 倪志良. 税制结构、税收凸显性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基于 279 个地级市数据的实证考察[J]. 当代财经, 2023, (4): 29-40.
- 陈珣, 徐舒. 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工资差距及动态同化[J]. 经济研究, 2014, (10): 74-88.
- 付文林. 住房消费、收入分配与中国的消费需求不足[J]. 经济学家, 2010, (2): 55-60.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侯云春, 韩俊, 等.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总态势与战略取向[J]. 改革, 2011, (5): 5-29.
- 胡永刚, 杨智峰. 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村产出与居民消费影响的 SVAR 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9, (7): 19-32+46.
- 黄隰琳. 中国经济周期特征与财政政策效应——一个基于三部门 RBC 模型的实证分析[J]. 经济研究, 2005, (6): 27-39.
- 陆铭, 陈钊. 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J]. 经济研究, 2004, (6): 50-58.
- 骆永民, 樊丽明. 宏观税负约束下的间接税比重与城乡收入差距[J]. 经济研究, 2019, (11): 37-53.
- 吕冰洋, 毛捷. 高投资、低消费的财政基础[J]. 经济研究, 2014, (5): 4-18.
- 吕捷, 王高望. CPI 与 PPI “背离”的结构性解释[J]. 经济研究, 2015, (4): 136-149.
- 吕伟, 许宏伟. 土地财政、城市偏向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J]. 财贸经济, 2015, (6): 45-56.
- 饶晓辉, 刘方. 政府生产性支出与中国的实际经济波动[J]. 经济研究, 2014, (11): 17-30.
- 吴俊培, 张昊泽. 共同富裕目标下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教育和社保就业财政支出的分析[J]. 当代财经, 2024, (1): 32-45.
- 杨翱, 李长洪. 城乡异质性、财政支出结构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J]. 财贸经济, 2016, (7): 21-33+93.
- 袁志刚, 朱国林.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经济分析[J]. 经济研究, 2002, (3): 56-64.
- 张伟进, 方振瑞, 黄敬翔. 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的变化——基于经济周期视角分析[J]. 经济学 (季刊), 2015, (2): 651-676.
- Arrow K J, Kurz M. Public investment, the rate of return, and optimal fiscal policy[M]. New York: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Press, 1970.
- Barro R J.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S5): 103-125.
- Blanchard O, Perotti R. An empir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dynamic effects of changes in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taxes on output[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2, 117(4): 1329-1368.
- Bouakez H, Rebei N. Why does private consumption rise after a government spending shock[J].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5, 40(3): 954-979.
- Burnside C, Eichenbaum M, Fisher J. Fiscal shocks and their consequences[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2003, 115(1): 89-117.
- Calvo G. Staggered prices in a utility-maximizing framework[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3, 12(3): 383-398.

- Coenen G, Straub R. Fiscal stimulus and exit strategies in the euro area[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king Paper, No.09/53, 2009.
- Fatas A, Mihov I. The effects of fiscal policy on consumption and employment: Theory and evidence[R].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2760, 2001.
- Gali J, Valles J, Lopez-Salido J D. Understanding the effects of government spending on consumption[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07, 5(1): 227-270.
- Mountford A, Uhlig H. What are the effects of fiscal policy shocks[J].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2004, 24(6): 960-992.
- Ramey V, Shapiro M. Costly capital reallocation and the effects of government spending[J]. 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1998, 48: 145-194.
- Turnovsky S. Fiscal policy, elastic labor supply, and endogenous growth[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00, 45(1): 185-210.

Dual Urban-Rural Structure, Urban Bias, and Resident Consumption

Wang Wen-fu, Zeng Bin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China)

Abstract : The key to build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with the domestic circulation as the main-body and the mutual promotion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ual circulation lies in expanding consumption, with the focus of this expansion on rural areas. The main goal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to boost rural consumer demand, and its implementation relies on the support of fiscal expenditure. By incorporating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into a New Keynesian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DSGE) model,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mpact of China's fiscal expenditure structure on consumption insufficiency and its transmission mechanism in this context.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root cause of consumption insufficiency may lie in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imbala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under the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Fiscal expenditure has exacerbated this imbalance, as China's fiscal spending has long been biased toward urban investment, which in turn increases the returns to urban factors of production. Although the labor from the rural sector can flow into cities and share some of the benefits of urban development, the rural sector is unable to invest in the capital markets. The capital returns are mainly captured by urban residents, this situation has led to a widening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further contributing to the overall consumption insufficiency in the country. While adjusting the fiscal expenditure structure to favor rural areas can alleviate this imbalance to some extent, it is unlikely to reverse the crowding-out effect of fiscal expenditure on consumption. Therefore, in order to expand and upgrade consumption, the government should adopt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to gradually eliminate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and achieve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 fiscal expenditure structur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household consumption;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责任编辑：王俊杰